

# 当代经济统计学的深化、提升与拓展

——邱东教授《经济测度逻辑挖掘：困难与原则》述评

罗良清 平卫英

**内容提要：**《经济测度逻辑挖掘：困难与原则》是邱东教授“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的第一册，主要针对“SSF经济测度报告”存在的问题展开述评，体现了该书作者对当代经济统计学的深层次思考。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基本功能”之辩作为开篇，指出测度“可行性”对其“必要性”的动态制约，探讨了GDP功能与核算体系的潜在挑战；以政府产出测度为例，区分了经济学中的“理论概念”与相应的“测度概念”，点出经济指标从来都是隐含着经济学立场的；基于邱东教授提出的GDP统计隐含四大测度困局，梳理宏观经济指标的测度原则及其之间的关系；围绕生活质量测度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测度的观念前提作出反思，指出其中存在的可加性疑点，并系统剖析了目前流行的不同类别方法的测度机理；最后阐述了邱东教授对经济统计学学科格局的观点，指出“超越GDP”的宏大目标并没有实现，经济统计学学科还需要深化、提升和拓展，经济统计学大有可为。

**关键词：**经济测度；可加性疑点；经济统计学学科格局；超越GDP

**DOI:** 10.19343/j.cnki.11-1302/c.2022.09.009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22)09-0119-09

## The Deepening, Improvement and Expansion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tistics: A Review of *Explore the Logic of Economic Measurement: Difficulties and Principles* by Professor Qiu Dong

Luo Liangqing & Ping Weiyang

**Abstract:** *Explore the Logic of Economic Measurement: Difficulties and Principles* is the first volume of *Critical Serie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tistics* by Professor Qiu Dong. It mainly review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SSF Economic Measurement Report*, reflecting the author's deep thinking 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tistic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debate on the "basic function" of GDP, points out the dynamic restriction of measuring "feasibility" to its "necessity", and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challenge of GDP function and accounting system. Taking the measurement of government outpu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 concept" in economic science, and points out that economic indicators always imply economic standpoint. Based on the four measurement dilemmas of GDP statistics proposed by Professor Qiu Dong,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ir relations are sorted out. Then it reflects on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life quality measurement and the conceptual premi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doubts about additivit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asurement mechanism of different types of currently popular methods.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Professor Qiu

Dong's views on the discipline pattern of economic statistics, pointing out that the grand goal of "beyond GDP" has not been realized, and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 statistics still needs to be deepened, improved and expanded, and there is much potential in economic statist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asurement; Doubts about Additivity; Discipline Pattern of Economic Statistics; Beyond GDP

## 一、概述

作为“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的第一册，科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邱东教授的《经济测度逻辑挖掘：困难与原则》<sup>①</sup>（邱东，2018），其中包括了对“SSF经济测度报告”<sup>②</sup>（Stiglitz等，2010）的5篇述评，一篇邱东教授与王亚菲教授2015年提交给国际收入与财富论坛特别会议<sup>③</sup>的论文，还有一篇对经济统计学的学科概述。

邱东教授的学科自觉意识比较强烈，这个批判系列与他在2013年出版的《经济统计学学科论》（邱东，2013a）一脉相承，并非仅仅限于借鉴国内已有相关成果，而主要基于对国际上经济统计文献的深入思考，批判视野是全球性的，即便是国际知名经济统计学者的著述、国际组织的经济统计标准手册，也需要对其测度机理“再寻找（re+search）”，从而达成学科研究的本意。

“SSF经济测度报告”是邱东教授给出的概称，原书中文版名为《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斯蒂格利茨等，2011）。该报告由斯蒂格利茨教授、阿玛蒂亚·森教授和菲图西教授主持，由全球顶级的经济学家团队<sup>④</sup>撰写，发表于2010年，是多年来少有的对经济测度问题的系统检讨和展望，其核心议题便是“超越GDP”，或者可以理解为经济测度的又一次“福利转向”。从全球发展和宏观管理的数据需求和现有的经济统计方法论基础看，这份文献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经济统计并不仅仅是繁琐枯燥的数据运算业务，如果坚持深入学科的专业发展过程，就可能体会到一直以来“指标选取”和“定义域确定”后面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纷争<sup>⑤</sup>，就可能体会到经济测度“必要性”与“可行性”之间的种种方法论纠结。

经济统计面临的社会现实不仅仅包含“随机不确定性”，更包含了“模糊不确定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照搬、套用数理模型的虚妄，只用“数理”讲“事理”的学科替代并不科学。用邱东教授的概括而言，经济统计学隐含着相当多“人类共同面临的测度难题”，不少已经“跨世纪”存在了，再智慧的头脑也无法一劳永逸地给出解决方案。

2012年邱东教授指出“SSF经济测度报告”的4个问题（邱东，2012）：一是，过多讨论宏观测度应该做什么，较少讨论当今的测度能够做什么；二是，过多地讨论宏观测度中存在的问题，较少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三是，问题和建议之间还存在许多断裂，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四是，忽略了常规统计与专题调查的区别，没有对新建议测度项目的成本估计，实地操作的可行性研究不够。

“批判系列一”可以看作当初批评的较为系统的展开，其中包括测度陷阱的标明，也包括邱东

<sup>①</sup>该书英文版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冻菊教授翻译，并在海外出版。Qiu D, Li D J. Logical Mining of Economic Measurement: Difficulties and Principles[M]. American Academic Press, 2019.

<sup>②</sup>国外有的文献将之称为“斯蒂格利茨报告（Stiglitz Report）”，但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成果太多，该名称缺乏特异性，故用三位主要作者姓的首个英文字母SSF而称之为“SSF经济测度报告”。

<sup>③</sup>该论文被选为大会交流论文，得到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机会。

<sup>④</sup>该课题团队包括了安格斯·迪顿、詹姆斯·赫克曼、丹尼尔·卡内曼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有安东尼·阿特金森、恩里科·吉奥瓦尼尼、艾伦·克鲁格、罗伯特·帕特南、尼克·斯特恩、凯斯·桑斯坦等学界翘楚。

<sup>⑤</sup>例如，美国罗格斯大学杰出教授休·罗考夫先生专门撰写过《联邦经济统计开发过程背后的论战》，2019年初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Hugh, 2019）。

教授对此的分析和某些建议。当然，研究无法穷尽，2021年出版的“批判系列二”《基石还是累卵——经济统计学之于实证研究》（邱东，2021）接续测度主题的研究，其核心篇目《SFD测度报告的经济统计学评论》是对斯蒂格利茨等主持的第二份经济测度报告的跟进研究，并列示了整个批判系列11本书的名目，以展示未来将继续讨论的相关议题。

经济统计学的困局源于经济学的两大扩展倾向（邱东，2013a）。在研究领域上经济学出现“学科帝国主义”倾向，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这势必造成学科面临更多的不确定问题；但与此同时，经济学又效仿经典物理学追求学科的硬化，要求研究结果的精细量化，这两种倾向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势必导致作为基础学科的经济统计陷入更多的困局：“必要性”与“可行性”之间的纠结更多。然而相反相成，正是这些测度难题的显性和隐性存在，从反面证明了经济统计学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法理性。

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将相关内容（无论是新见，还是质疑）穿插在经济统计学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避免许多专业误解。仅使用所谓成熟内容的教材编写思路对开启思考并无益处，还容易让学生形成“经济统计学似乎非常简单”<sup>①</sup>的印象。

由于“SSF经济测度报告”主要内容形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所以与2018年的“SFD经济测度报告”主席卷（OECD，2018）和专家卷（Stiglitz等，2018）相比，前者的论述比较平稳，GDP统计、生活质量测度和可持续发展测度三分天下，容量彼此匹配。后者则在主席卷中专门安排了经济下行的测度，专家卷的议题也紧扣当下全球大势。上述两个报告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纳入经济统计学的教学过程中。

## 二、关注经济统计的相关性：GDP功能与核算体系的潜在挑战

为什么要以GDP的功能讨论作为开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GDP评价的两极分化，美国一批知名人士将之视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邱东，2018），而社会乃至学界好多人却鄙视之至极，似乎GDP成了万恶之首（伊桑和玛苏德，2016）。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受到如此多的“差评”，该指标却多年来稳稳地处于经济测度的中心位置。虽然“超越GDP”呼声迭起，却有业内人士冷静地建议将口号修正为“GDP及其超越”。

无论如何，一个经济统计指标，怎么有资格成为世纪发明（Diane，2014）？R·肯尼迪竞选总统为什么要大段讲到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弊？如何用专业认知来回应“统计素人”的质疑？为什么原来以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为主，却需要将“政府产出（G）”放进总量指标？GDP指标从空间（不同类型国家）和时间（不同发展阶段）上看是否普遍适用？作为经济发展和国势判断的所谓核心指标，GDP数据结果的可靠性究竟如何？这些基本问题都与GDP指标的功能相联系，归结到“基本功能”之辩，即为经济指标究竟应该客观反映经济现实，还是服务决策要求？两种主张的争论自经济统计学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涉及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勒佩尼斯，2018），涉及到“事实与价值”二分逻辑能否贯通或坚守，涉及到社会各界对经济统计的基础性需求，涉及到统计指标顺应社会需求的与时俱进，涉及到经济统计与经济学基础概念的关系，涉及到经济统计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和社会认知等学科带有哲学思考的深度关联。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才能发现经济测度中所隐含的陷阱及其对测度结果的影响，才容易发现测度“可行性”对其“必要性”的动态制约，才能在

<sup>①</sup>本册附录二（第144-145页）专门阐述经济统计学专业特质和困难。

经济测度过程中达成“三基”：基于“基层逻辑”运用“基础数据”<sup>①</sup>反映“基本事实”，从而切实发挥服务决策的功能。

呼吁“超越GDP”侧重于“测度福利转向”的必要性，而提出“GDP及其超越”则更多地着眼于其可行性。2015年国际收入与财富协会召开特别会议，专题研究国民账户体系（SNA）的未来，正表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纠结于改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93年SNA采用了“中心框架+卫星账户”的模式，其实就是为了顺应发达国家核算中“福利转向”的倾向（Lequiller和Blades, 2014; Vanoli, 2014）。然而，新旧构成项目之间的“可加性”困难却使得体系扩充举步维艰。与多数专业研究仅从核算对象角度改进SNA的思路不同，邱东教授从新兴国家核算主体、全球公共品供给和需求、经济统计范式转变这三个角度来探讨SNA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体现了多维度的思考。

### 三、经济统计指标与经济学基础概念

经济统计学是经济科学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学科基础（MitraKahn, 2011）。设计和测度经济统计指标，固然要以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然而二者的作用是双向的、多轮次的动态过程。经济统计学是经济理论与宏观管理实践之桥，经济科学中的“理论概念”或“定义性概念”未必都能测度，此时需要经济统计学设计相应的“测度概念”或“操作性概念”。“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计划出版的第5册《“使女”的揭露：当代经济学的基础性缺陷》将专门讨论这个议题，然而本册中其实已经涉及到该议题，主要是与政府产出测度相关的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关系。

如果政府不是与企业、居民户相并列的独立经济主体，其活动就不能纳入生产范围，不能计算产值。这个争论，在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得到突破，战后因“马歇尔计划”被欧洲各国所接受，成为产值计算范围的国际标准。

邱东教授认为，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带来的宏观效益，是政府这个经济主体最大的产出之一。政府产出采用其成本要素或采购支出来测度，却没有考虑政府“政策服务产出”，这是一个重大遗漏。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看，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同样干预经济<sup>②</sup>，只不过形式较为多样。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实际融合国家间的博弈，而“混合经济”倒是对现实更为接近的概括。经济理论从来都需要按照经济过程变革而做出相应的发展，而经济指标调整正是这种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济指标从来都隐含经济学立场。采用GDP指标而非国民收入（NI），即意味着承认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否则数据与理念将出现重大偏差，定量关系上无法自圆其说，这是主张自由市场的学者同时采用GDP进行实证分析的一个逻辑偏误。

在国势判断上，邱东教授选用中国<sup>③</sup>、日本、突尼斯和“中等收入陷阱”<sup>④</sup>国家，说明了GDP在经济发展的测度上非常容易出现偏误，进而认为不能把GDP增长混同于经济发展。

经济是政治的日常形式，与政治其实并不可分，经济学本质上只能是政治经济学，硬性将政治因素剔除不过是一种知识的僭妄（菲尔拉蒙德，2015）。理念逻辑上“法经济学”<sup>⑤</sup>的产生和发展就

<sup>①</sup>邱东教授强调指出，应该注意“基础数据”与“中间数据”的区别，“中间数据”可能包含了数据加工者的价值判断，而“基础数据”相比而言更接近于基本事实。

<sup>②</sup>“李斯特梯子”可以形象地概括国家间博弈的政府作用，经济史中的佐证非常之多。

<sup>③</sup>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

<sup>④</sup>邱东教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也做了厘清探索。

<sup>⑤</sup>SNA五大经济主体采用的是“广义政府（general government）”概念，不仅指行政，还包含了立法和执法。特别是在干预国外经济时，强国往往借助于法律手段结合行政手段，行使“长臂管辖”等所谓“软实力”就意味着强国政府对他国政府和企业乃至居民的“组合拳”。

表明了这一点。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真正理解当初为什么需要从NI扩充为GDP（GNI），才能真正做好政府产出测度，也才能对经济理论思考做出公理性的正向反馈。

#### 四、GDP的测度困难与测度原则

尽管GDP指标已经使用多年，按照业内诸多人士的意见还将继续沿用下去<sup>①</sup>，并不是说该指标的测度方法符合现实经济关系，相反却是隐含了许多测度陷阱，不过尚未找到更为合适的替代指标。故而，不能因为其流行而误以为GDP统计非常简单。

在宏观经济学的第一章中，GDP指标得到了简明的阐述，典型的例如曼昆教授风行全球的教材（曼昆，2015），似乎将GDP讲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忽略了相当多本应该讨论的测度机理和陷阱。其副作用便是，学生们误以为GDP统计就是这些简单内容。然而这种清晰是一种假象，相当于把雾境的照片拍成了朗朗乾坤。经济统计数据的用户应该对GDP内涵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否则容易沦为“假数真算”的形式化动作<sup>②</sup>。

在对“SSF经济测度报告”的第二篇评论文章中，邱东教授剖析了GDP统计隐含的4个特别的测度困局。第一，实际最终消费与最终消费支出的真实关系。测度“实际最终消费”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支付和收益形式多元，若只纳入实物项则无法满足调整的本意。第二，政府产出测度是否周全，这个问题需要从部门增加值、产出效率和直接法是否可行等方面深入思考。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产出再增加项目，则其占GDP的比重就更大了，这在发达国家恐怕无法接受。让测度者左右为难，是为陷阱。第三，无酬家务是否应该计入产值，这个世纪测度难题需要从经济统计的体系“一致性”来全面把握，这样才容易明了测度陷阱之所在，才能体会到经济统计学的深层次发展之必要。例如，“时间利用账户”的核算道理究竟何在？值得警惕。第四，如何确定所谓“遗憾性支出”，这个测度难题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托宾和诺德豪斯于1972年提出，50年间仍然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结论。该问题与经济测度的福利转向密切相关，其容量单由一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也无法覆盖。

科伊尔教授说，理解GDP如同难度逐步升级的电脑游戏，初看特别容易，到了一定程度就寸步难行（科伊尔，2017）。邱东教授指出了经济统计学的专业特质和困难<sup>③</sup>：指标定量的社会需求与专业可行性不成比例；为测度、核算和估算所做的投入与产出不一定成正比；方法复杂性与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不一定成正比（邱东，2001）；理论严密性与指标可靠性不一定成正比；扎实的经济指标方法或数据结果是基于其上的模型建构和分析结论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前提。

第三篇评论文章则是从一般化的角度来挖掘GDP测度的逻辑机理，第一节概括总结了GDP测度的困难<sup>④</sup>：指标要素与指标的可测度性问题；“指标口径”两可状态下正负效应的制衡问题；观察（核算）值与估算值的优先选择问题；GDP内部不可分事物的切割问题；GDP统计中的价格难题；GDP指标拓展分析的混沌区，“基准不准”问题、“悖变”判断之困、“相关”的测度风险、多轮次双向影响的分析，等等。第二节概述了宏观经济指标的测度原则。在宏观经济指标的测度中，有的文献直接提出或阐述了有关测度原则，例如“三方等价原则”“一年原则”“体制无关性原则”等

①“GDP及其超越”是一种“做加法”的概念，保留GDP再做补充，而“超越GDP”是对其的否定。但是还要注意到，“做加法”的建议势必与经济统计所能使用的社会资源约束相悖。

②很多人以为，解决了虚报瞒报问题，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数据结果，他们往往忽略了经济测度中所难以处理恰当的种种困局，实际上这种看法并没有将经济统计当作一个专业学问，不知道其中所隐含的不确定性是多元的，处理起来往往需要多维思考，不能误以为“数理”可以全然代替“事理”。

③参见本册附录二第144~145页。

④本册附录二（第141~142页）也论及此议题。

(Michael, 2004)。有的文献论述了经济测度应该遵循的基本考量,例如,通常观测值应该优先于估算值,或可概括为“观测值为主原则”;测度之前通常都需要先确定“生产范围”,或可概括为“生产范围原则”;经济统计不能充当道德判官,或可概括为“测度道德无涉原则”。

邱东教授还特别强调不同测度原则间的关系,提出了“测度范围协调适度原则”,这个原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无酬家务劳动不能计算产值——测度系统化所隐含的一致性原因。当然,对测度原则的思考应该是开放的,而且还应该注意诸原则的“谱系化”思考。

## 五、经济测度的福利转向时机是否成熟?

邱东教授认为,“SSF经济测度报告”的三大内容,从GDP统计到生活质量测度再到可持续发展测度,实际上构成了经济测度三个级别,其测度边界各有不同,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各有不同。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就曾出现过“社会指标运动”,可见,从传统GDP统计到经济测度的“福利转向”<sup>①</sup>并非新动议,研究的关键在于可行性,需要认真判别:测度改革的时机是否真的成熟。

第四篇评论文章讨论生活质量测度。“SSF经济测度报告”刻意区分当下福利(生活质量)和未来福利(可持续发展),从测度难度来看,当下福利测度的可靠性一般高于未来福利的估算结果,所以指标和数据用户应该充分重视这种区分。邱东教授对生活质量测度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其“可行性”上,福利多元但测度有限,二者之间的张力使得三类测度理念(主观福利观、能力观和公平分配观)都存在可加性疑点,需要进一步探索其机理。例如:不同文化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决与测度的国际标准确立如何协调?休闲究竟能否测度?极值单边扩大<sup>②</sup>对不平等测度的影响?问卷法使用中回复者和测度者素质对其数据质量的影响究竟如何?是否面临道德风险?“支付意愿法”隐含了什么样的局限?福利调查中样本的代表性能否得到保障,又如何保障?“能力观”与“公平分配观”使用中如何选择客观特征因子?应该选择多少?各自的权重如何考虑?在采用合成指标时又如何面对其方法论的根本性质疑<sup>③</sup>?“生物技术法”测度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这些疑点都指向了生活质量测度的可行性,测度陷阱颇多,需要指标和数据用户当心。即便是生活质量测度的“必要性”,也并非天经地义,还是存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家计调查固然可以入户,但究竟应该或可能入多少户?以什么样的频率入户?需要居民户在生活质量测度上额外投入多少?这是不是一种“信息税”或“信息支付附加”?如何确保居民户和社会为生活质量测度所投入公共资源的正当性?是否应该谨慎确定和调适福利测度的操作边界?

第五篇评论文章讨论可持续发展测度。从篇名可以看出,邱东教授对其必要性的存疑更多,先是反思“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前提:“主体追问”<sup>④</sup>在于究竟是谁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穷国的当下”与“富国的未来”哪样更为重要?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历史欠账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需要发展中国家一起还债甚至需要偿还更多?资源环境的还债是否应该考虑时期分摊问题?因为可持续发展造成的环境资源新债又如何分担<sup>⑤</sup>?邱东教授特别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所隐含的两个基本

①边沁先生当年就主张并尝试测度“快乐指数”,库兹涅茨教授也更为关注经济总量指标的福利指向。

②典型的例如,从百万富翁到亿万富翁,使得社会中多数人沦为分配低水平人群。

③邱东教授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论反思》(邱东,2013b)中提出,当量转化关系能否一般化地确定,构成指标间的信息重叠。“SSF经济测度报告”指出了“异构同分”的可能性,只要平均分相同即可。

④邱东教授认为,在资源和利益国家间严重偏态分布的格局下,“主体追问”格外必要,遇到貌似天经地义的好事情,例如自由、平等、效率、可持续等等,都需要问一下,究竟是“谁的”?到底有没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份儿?

⑤例如太阳能电池,欧美固然用上了清洁能源,但生产清洁能源设备的废料却留存在生产国,这笔账究竟应该怎么算?

假定：“同偏好假定”和“同智能假定”<sup>①</sup>，这些基本道理搞不清楚，就贸然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测度，模型或许看似科学，却很容易造成“假数真算”的结果。

进而反思“可持续发展测度”的观念前提，这需要采取专业态度。邱东教授指出了5个基本问题：可持续发展测度与“事后核算（ex-post accounting）”的关系；空间范围的确定与人类能力的局限；时间范围的确定，人类行为的时滞影响如何确定；流量测度与存量测度的关系，这里主要表现为广义资本的测度；国家作为基本测度单位的坚持，国家“责任份额”究竟应该如何确定。

对观念前提的反思，有助于深入剖析目前流行的各种可持续发展测度方法，“SSF经济测度报告”将可持续发展测度方法分为4类：大型“仪表盘”（即指标体系）、复合指数（合成指标）、校正GDP的方法（即基于价值指标的修正）、“关注类”资源的指数（即一类实物指标）。邱东教授比较系统地剖析了不同类别方法的测度机理，概括而言：大型“仪表盘”的优势在于其包容性强，但面临测度可用资源的约束，且无法给出“单一数字表现”的测度结果；复合指数可以给出种种排序，但无法回答邱东教授提出的“可加性质疑”，数据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都需要警惕；校正GDP的方法自然地继承了价值指标的优点和缺点，在结合“合成指标”使用时价值指标和合成指标这两类加总方法都需要面临“可加性”的“悖境考验”，其优点和缺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只取其一；“关注类”资源的指数可加范围有限，无法成为主流指标。

## 六、关于经济统计学学科格局的进一步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经济统计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但邱东教授认为，SNA并非仅仅五大核算系统，经济统计学的内容就更不止于此（佟哲晖和邱东，1992）。在经济统计学学科发展的追踪和教材的修订中，邱东教授形成了对学科格局比较系统的看法。201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60周年专辑特邀，邱东教授发表了《经济统计学：德国传统到当代困境》（邱东，2016）。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7个方面。

第一，三种经济统计“学科观”。什么是经济统计学？可将学者们的看法归结为三大类“学科观”。一种将经济统计学视为研究数量规律的社会科学分支，可称之为“数量规律说”；一种将经济统计学视为数理统计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可称之为“数理应用说”；还有一种将经济统计学视为以经济测度、国民经济核算为主体的具有特定对象的统计方法论学科，可称之为“特定方法论说”或“测度与核算说”。邱东教授分别概述了三种学科认知的主要特点、优点和缺点，指出“计量”是否需要“较质”是统计学科的社会科学取向与数理取向之间最为关键的区别。

第二，三大类指标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经济统计指标包括三大类<sup>②</sup>（邱东，2003）：实物指标（physical indicator）、价值指标（monetary aggregate）和合成指标（composite indicator）。概括这三类指标并加以系统比较，有助于判断“可加性”和“可比性”的达成程度。邱东教授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不同类型指标，特别是价值指标和合成指标的测度机理。

第三，经济统计的基本算法。邱东教授认为，再高深的计量模型，也不过是加减乘除的衍生品，因此就无法逃脱“可加性”和“可比性”这两项基本要求的制约。概括经济统计的基本算法，正是为了更好地检验不同处理是否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可加或可比。

<sup>①</sup>“同偏好假定”指后代的偏好与我们的相同，我们喜欢石油，子孙也喜欢石油。“同智能假定”指后代的智商和能力与我们相同，只能顺从我们设定的路径。

<sup>②</sup>如果将“指标体系”也作为一种指标方法，则为4种。如同“SSF经济测度报告”将大型“仪表盘”归结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测度方法。邱东教授1990年在博士论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系统分析》中对4种指标方法做了概括阐述，与前文中“SSF经济测度报告”所述4类生活质量指标一致，可参见邱东，《谁是政府统计的最后东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40页。

第四，经济测度的7个悖律，“配第切割”与测度边界。由于经济统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多元且复杂，使得其操作往往处于立体性的悖境。总结起来大概包括7个悖律：“边界悖律”“中性悖律<sup>①</sup>”“定格悖律”“标准悖律”“真实悖律”“得失悖律”和“民主悖律”。邱东教授2012年提出了本体论意义、认识论意义和操作意义三条测度边界（邱东，2012），2015年进一步提出“配第切割”的概念（邱东，2015），强调配第先生创建“政治算术”时对“不可计量事物”的预先切割。由于可能涉及到测度边界硬性划分的问题，人类需要提防“知识的僭妄”，不能任性地否定“不可计量事物”。

第五，经济统计学的外生和内生发展。学科的深化、提升和拓展存在着外生发展和内生发展两种基本方式<sup>②</sup>，邱东教授在相关文章中概述了学科外生发展和内生发展的概念、特点和主要内容（邱东，2016），特别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第六，经济统计学的结构和三个层次。经济统计学包括宏观经济统计、金融统计学、外贸统计和社会统计学等分支统计学（邱东和杨仲山，2004）。邱东教授认为，经济统计学的三个学科层次应该以其测度方法论的提升为导向维度。初级经济统计学是其基础概念、方法和原则的阐述，回答“如何做”和“为什么这么做”的基本道理；中级经济统计学更多地关注经济测度、国民经济核算和国际比较的机理；高级经济统计学侧重于学科的宏观构建：方法论的体系化（内在一致性）；经济测度、核算和比较的公理提炼；经济统计思想的时空连接；经济统计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外部关联审视（外部一致性）（邱东和蒋萍，2008）。

第七，经济统计学的4个范式和发展大势。邱东教授分别概述了“国势学”范式、“政治算术”范式、“社会统计学”范式和“现代SNA”范式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国势学”范式和“社会统计学”范式更关注测度的必要性（社会意义）；而“政治算术”和“现代SNA”范式更关注经济量化测度自身的系统性（勒盖耶和布莱兹，2018）。故而，更需要关注测度的可行性，测度对象往往局限于经济维度，从而其内涵也往往需要拓展。以此4个学科范式为标记，邱东教授给出了“经济统计学发展大势”：未完成的“W”。作为经济统计学的专业学者，我们的研究大约处于这个“W”最后一段的中间某个地方，“超越GDP”的宏大目标并没有实现，学科还需要深化、提升和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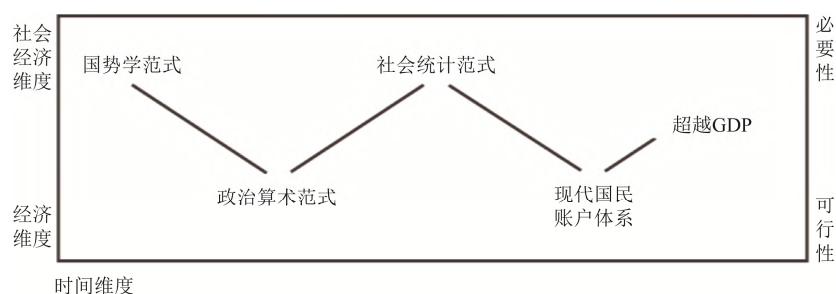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统计学发展大势——未完成的“W”

### 参考文献

- [1] 菲尔拉蒙德. 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GDP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M]. 刘路, 赵蔚群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5.  
[2] 科伊尔. 极简GDP史[M]. 邵信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sup>①</sup>邱东教授曾在厦门大学统计学院就此议题做过报告。

<sup>②</sup>最开始是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才有了生物统计和农业统计的研究，当特殊领域的统计方法能够提供基础“材料”了，才有一般化的数理统计学。

- [3] 勒盖耶, 布莱兹. 理解国民账户[M].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译.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 [4] 勒佩尼斯. GDP简史: 论GDP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M]. 曲奕, 王建斌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5] 曼昆. 经济学原理: 宏观经济学分册[M]. 第7版. 梁小民, 梁砾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6] 邱东. 从市场实现看应用统计方法研究的桥梁作用[J]. 统计研究, 2001(4): 16-19.
- [7] 邱东. 谁是政府统计的最后东家[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 [8] 邱东. 宏观测度的边界悖律及其意义[J]. 统计研究, 2012, 29(8): 83-90.
- [9] 邱东. 经济统计学学科论[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a.
- [10] 邱东. 多指标综合评价: 方法论反思[J]. 经济统计学(季刊), 2013b(1): 39-47.
- [11] 邱东. 全球核算体系SNA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潜在挑战[J]. 经济统计学(季刊), 2015(2): 24-32.
- [12] 邱东. 经济统计学: 从德国传统到当代困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52(6): 669-676.
- [13] 邱东. 经济测度逻辑挖掘: 困难与原则[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14] 邱东. 基石还是累卵——经济统计之于实证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 [15] 邱东, 蒋萍. 国民经济统计前沿问题[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 [16] 邱东, 杨仲山. 当代国民经济统计学主流[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 [17] 佟哲晖, 邱东. 国民经济统计学[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 [18] 伊桑, 马苏德. GDP简史: 从国家奖牌榜到众矢之的[M]. 钱峰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 [19]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阿玛蒂亚·森, 让-保罗·菲图西.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 阮江平, 王海航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
- [20] Diane C. 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1] Hugh R. On the Controversies Behind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Economic Statist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 33(1): 147-164.
- [22] Lequiller F, Blades D. Understanding National Accounts: Second Edition[M]. Paris: OECD Publishing House, 2014.
- [23] Michael W. Quantifying the World: UN Ideas and Statistics (United Nations Intellectual History Project)[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4] MitraKahn B H. Redefining the Economy: How the 'Economy' was Invented in 1620[J]. He Economic History & Conditions, 2011.
- [25] OECD. Beyond GDP: Measuring What Count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M]. Paris: OECD Publishing House, 2018.
- [26] Stiglitz J E, Fitoussi J P, Durand M. For Good Measure: Advancing Research on Well-being Metrics Beyond GDP[M]. Paris: OECD Publishing House, 2018.
- [27] Stiglitz J E, Sen A K, Fitoussi J P.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M].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 [28] Vanoli A. National Accoun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Wherefrom? Whereto?[C]. EUROSTAT Review on National Accounts an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2014.

#### 作者简介

罗良清, 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

平卫英(通讯作者), 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电子邮箱: pingweiying815@163.com。

(责任编辑: 刘雅欣)